

三国争霸,争在夷陵

——简论三国时期宜昌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

王前程, 杨爱丽

(三峡大学 文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宜昌, 古称“夷陵”, 乃“楚之西塞”。在汉末三国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 是名副其实的“争地”, 乃三国兵家们拼死争夺的焦点; 三国之争, 争在荆州, 荆州之争, 争在夷陵。蜀汉集团的悲剧始于夷陵之失, 夷陵成为蜀汉英雄们永远的伤痛。

关键词: 夷陵; 战略价值; 三国主战场; 蜀汉悲剧

中图分类号: K 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08)05-0005-05

中国古代兵学大师孙子曾说:“用兵之法, 有‘散地’, 有‘轻地’, 有‘争地’……我得则利, 彼得亦利者, 为‘争地’。”^[1]我方得到此地十分有利, 敌方得之同样有利, 对这样的地区敌我双方都会拼死命去争夺, 这就是“争地”, 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今人所说的“军事战略要地”。

宜昌, 古称“夷陵”、“峡州”, 酈道元《水经注》称为“楚之西塞”, 乃巴蜀文化与楚文化交汇的咽喉之地。历代战乱争战, 凡有眼光的军事家无不将夷陵视为必争的战略要地。汉末三国时期, 夷陵更是名副其实的“争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夷陵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魏、蜀、吴等政治集团的兴衰成败, 实为忽略不得的“夺命之所”。

一、夷陵: 三国兵家关注的焦点

东汉末年, 当曹操翦除群雄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之后, 南方的荆州就立刻成了军事家们关注的重点。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诸葛亮作“隆中对策”, 认为“荆州北据汉沔, 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 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地”, 只有夺取荆州, 方能争霸天下。《三国志·鲁肃传》记鲁肃多次向孙权进言应尽快占领荆州, “荆楚与国邻接, 水流顺北, 外带江汉, 内阻山陵, 有金城之固; 沃野万里, 士民殷富, 若据而有之, 此帝王之资也。”南朝史学家裴松之给《三国志·郭嘉传》

作注, 亦记有郭嘉生前力劝曹操“当先定荆”的建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如实详尽地描述了诸葛亮、鲁肃等谋士对于荆州的精辟分析。足见当时曹、刘、孙三大集团都清楚地看到了荆州所具有的巨大战略价值。

然而, 东汉的荆州是一个广袤的区域, 其中心地带乃是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也正是古代楚国的心脏所在, 位于中国中部, 是通往东西南北的要冲。汉末三国时期, 这个中心区域又有三个战略要点, 即北部的襄阳、东部的江夏和西部的夷陵, 正好构成三角形的三个角区。而在这三个角区中哪一个角区又是最重要、最致命的呢? 显然是夷陵。因为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占据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就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 可以建造大型战船顺流而下, 形成势不可当的有利局面。夷陵处于长江的上游与中游的接合部位, 占据着长江西陵峡峡口的险要地形, 素称“川鄂咽喉”、“三峡门户”, 向西可以经略巴蜀之国, 向北可以进击中原大地, 向东可以威逼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真可谓“牵一点而动全局”。

对于夷陵地区的非同寻常的战略价值, 曹、孙、刘三方均十分敏感。赤壁之战前, 刘备从襄阳南下后首先试图抢占的要地就是当阳、夷陵一线, 只是被曹操大军迅即追袭而未果。赤壁之战后, 曹操派大将曹仁据守南郡江陵, 周瑜率大军围追, 双方死命争夺的却是江陵之西的古城夷陵。早在孙权继位之初, 东吴悍

收稿日期: 2008-06-03

作者简介: 王前程(1963-)男, 湖北浠水人, 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和传统文化研究。

将甘宁就力劝孙权西征荆州占据夷陵，“南荆之地，山陵刑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2]《甘宁传》》这里所说的“南荆之地”和“楚关”就是指夷陵。后来孙权倾全力夺占了夷陵等地，并改夷陵为“西陵”，从此东吴一直派遣名将重兵布防西陵。

自然，由于经营夷陵地区的时间最久，东吴的军事家们对于夷陵地区战略上的致命性也最为敏感。东吴黄武元年（222年），镇守夷陵的大将陆逊给孙权上疏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东吴凤凰三年（274年），大司马、荆州牧陆抗在重病中给吴主孙皓上疏说：“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袭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有不虞，当倾国争之。”陆逊父子的忧虑后来终于应验了：天纪四年（280年），晋军水军将领王濬兵出夷陵，顺流东下，攻无不克，很快就灭了吴国。足见三国争霸的关键在荆州，而荆州的关键在夷陵，即夷陵的得失关乎全局的生死成败，这是三国兵家们都曾意识到却又无法左右的要害问题。

二、夷陵：三国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曹操忙于中原战事、孙策兄弟忙于江东创业之时，刘表治下的夷陵地区相对平静。但自曹操将战略重点转向南方荆州之后，夷陵地区便成了各方反复争夺、硝烟弥漫的主战场之一，其战争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宏大、战斗之惨烈、关系之错综复杂，在汉末三国时期都是不多见的。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王濬灭吴这七十来年中，夷陵地区就一直争战不休，小规模战斗不计，伤亡惨烈的大规模争战就不下十次，著名的有曹刘当阳之战、孙曹夷陵争夺战、关羽败走麦城之战、吴蜀夷陵之战、陆抗夷陵平叛之战、王濬兵出夷陵之战等。

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大军直捣荆襄大地。屯驻樊城一带的刘备集团急忙南撤，由关羽率水军沿汉江南下，刘备、诸葛亮率步军沿荆襄官道南下，约定在江陵会合。但刘备、诸葛亮这一路兵马并未走直线直趋江陵，而是折向西南的当阳一带。这并非刘备、诸葛亮等人迷失了方向，而是他们按照“隆中对策”的既定方针试图抢占江陵西北部的战略要地夷陵以控制进攻益州的门户。《三国志·先主传》载：“曹公将精骑

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乐进传》亦载：“（乐进）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临沮，在今湖北远安境内；旌阳，在今湖北当阳境内。由此可知，刘备、诸葛亮在当阳一带活动频繁，还联络了不少山地部族，授部族首领以官职，以图收服夷陵地区的部众。但是，由于曹操急行军及时追赶至当阳，并在当阳长坂坡一带大败刘备，致使刘备进占夷陵、江陵的计划彻底破产，只好改变原定计划，“斜趋汉津”与关羽水军会合，逃奔夏口。此一战曹操不仅重创了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而且完全打乱了刘备集团控制夷陵以西进的战略企图。

孙、刘联军在赤壁击退曹操大军后，双方争夺的焦点依然是夷陵。周瑜率东吴大军乘胜追击曹操，曹操退回北方，派大将曹仁负责江陵、夷陵一线防务。周瑜在江陵一带与曹仁隔江对峙，却派甘宁先行攻占了夷陵，从而打乱了曹仁的周密部署。曹仁急忙派重兵试图夺回夷陵，周瑜亲率主力驰援甘宁，双方展开激战，死伤惨重。经过一年多的争夺战，曹仁被迫全线撤退，夷陵、江陵一带终被孙权、刘备集团控制。

赤壁会战后，荆州一而分三：曹操占有汉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刘备占据荆州的西南部；孙权据有荆州的东南部。当刘备势力不断膨胀、孙刘矛盾日益激化时，曹魏乘机进行挑拨，联络东吴发起了荆州争夺战。建安二十四年（218年），孙权、吕蒙趁关羽北上进攻樊城之机，成功地袭占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城，并派陆逊攻占夷陵、秭归一线，封锁峡口切断了刘备与关羽的联系。仓皇南撤的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2]《吕蒙传》》麦城、漳乡在今湖北当阳、远安境内。关羽本意是要西撤夷陵，守住这一入川之“门户”，不料早被陆逊切断，只好折向西北方向沿山道进入尚被蜀汉控制的房陵、上庸地区（今湖北房县、竹山一带），但终被吴军所追杀。此一战役使刘备集团损失惨重，被彻底挤出了荆州；曹操集团不仅解了军事重镇樊城之围，还扩大了势力范围；而大获全胜的则是东吴集团，荆州大部为东吴所有，从此东吴牢牢地控制了夷陵、秭归、江陵等战略要地，改变了蜀汉和曹魏随时从水路进攻东吴的危险局势。

章武元年（222年），蜀汉集团为夺回关羽丢失的荆州，发动了大规模伐吴战争，即《三国演义》描绘得最详细、最精彩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夷陵之战。罗贯中说刘备统帅了七十五万大军进攻夷陵，显然带有夸张成分，但从《三国志·陆逊传》等传的记载看，各方投入的兵力至少在五万人以上，可见规模确实不小。这

一战役战线较长,从秭归至宜都一带数百里的长江两岸皆是拼杀的战场。历时也久,从头一年的七月打到第二年的八月。最后以刘备惨败告终,蜀汉军队死伤以万计,以致“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实为一次异常惨烈的大战。

吴国后期,蜀汉已亡,曹魏亦为晋所取代,三足鼎立之势变成了晋吴对峙,夷陵地区也就成了吴、晋争夺的前沿。凤凰元年(272年)吴国西陵督步阐率众降晋,名将陆抗立即亲率大军奔赴西陵平叛。西晋为了尽快控制夷陵这一“争地”,急令各路兵马驰援步阐:车骑将军羊祜率部直捣江陵以分吴兵之势,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从西向东杀向夷陵,荆州刺史杨肇率步军从东向西杀向夷陵。局势对吴国相当不利,吴军众将担心江陵的安全,力劝陆抗不要救援西陵,陆抗力排众议,说:“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而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坚定了吴军夺回西陵的决心。陆抗在西陵城外采取了围点打援的办法,对西陵城围而不攻,重点打击前来增援的杨肇一路兵马,大败杨肇,羊祜等路兵马被迫撤军,已成孤城的西陵很快就回到了吴军手中,吴国转危为安。此战充分显示了陆抗过人的战略眼光与军事才能。

陆抗死后,吴国缺乏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加上政治上腐败透顶,使西晋王朝加快了灭吴战争的步伐。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冬至太康元年(280年)春,西晋共派出六路大军进攻吴国,但最有成效的一路军马则是王濬的水军。王濬建造了巨大的战船,从益州顺流东下,首先攻占了吴国丹阳城(今秭归境内),接着向西陵进发。吴军在西陵一带以铁锁横江,拦截晋船。王濬用麻油火炬烧毁铁锁,大败吴国水军,攻克西陵城。从此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石头城下,孙皓出降。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此诗所写正是晋吴夷陵大战的情形和结果。

由此可见,宜昌(夷陵)地区无疑是汉末三国时期最为典型的“争地”之一。从上述几个战例来看,为夺取夷陵地区的掌控权,作战双方无不全力以赴,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亦在所不惜,因为明智的军事家们都清楚:如果不付出惨重代价抢占夷陵,就必将为此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蜀汉集团的悲剧最能够说明问题。

三、夷陵:蜀汉英雄永远的伤痛

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顺应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

意愿,在《三国演义》中将蜀汉人物塑造造成我们民族的英雄,将他们所执着追求的统一大业视为民族的正义事业。十分可悲的是,蜀汉英雄不仅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而且最早走向死亡之路,成为无数后人伤心叹惋的悲剧故事。对于蜀汉英雄的失败,许多学人以为“大意失荆州”是其祸根。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何以失荆州?失了荆州又为何难以夺回?我以为症结在夷陵,即蜀汉失在荆州,荆州失在夷陵,夷陵的丢失直接影响了蜀汉的前途和命运。

夷陵地区处在荆州的西面,地形颇似一个横卧的漏斗,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衔接开阔的平原,如同漏斗的大口,大江从中穿过。以夷陵为依托,向西可以逆流而上进入益州,向东可以直捣荆州腹地江陵,向东北可以攻击宜城、襄阳、南阳一线,向东南可以威逼武陵(今湖南常德)、长沙一线,易守难攻,且可进可退,实为兵家屯兵据守的理想之地。如前所述,蜀汉集团早在赤壁之战前就敏感地意识到了夷陵地区的战略地位,赤壁之战后又控制、经营夷陵地区达十年之久,但为什么后来却在顷刻间丢失了夷陵,进而丢失了整个荆州和上庸之地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麻痹大意,没有足够重视夷陵的防务。正如陆逊父子所云,夷陵的得失关乎整个荆州的安全。蜀汉集团在建安十六年开始了夺取益州的战争,经过三年的争战终于如愿以偿,孙、刘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随之逐渐激化。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刘备夺得益州为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进而派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急忙亲率五万大军东出夷陵,进驻公安,并派荆州守将关羽奔赴益阳与吴军对峙。孙、刘之间的摩擦虽然后来因为刘备作出让步而得以化解,但这足以引起蜀汉集团的警惕:强敌觊觎荆州,荆州防务不可忽视。

那么,荆州防务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当然是夷陵地区,因为即使关羽把江陵等地丢失了,可火速退保夷陵坚守待援,尚有夺回江陵等地的希望,而一旦夷陵失守,江陵等地则再无挽回的余地。可是,无论从《三国志》等史籍看,还是从小说《三国演义》看,蜀汉集团对于夷陵地区的安全问题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蜀汉集团让关羽坐镇江陵,却从未派遣名将率重兵把守夷陵,关羽也没有把防务重心置于夷陵。如果说刘备、诸葛亮在夺占益州的三年战争中尚无暇顾及夷陵防务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夺取益州之后的四年中未派遣任何得力大将和智谋之士到夷陵来加强守备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近人武樗癭云:“窃以为荆州之失、关公之亡,惟孔明一人实尸其咎……孙权屡索荆州,诸葛瑾且奉使至蜀,权不能须臾

忘荆州,孔明亦知之矣。余以为成都粗定,即应仍遣赵云回荆州助守……荆州固若金汤矣。虑不及此,岂非智者之一失乎?”[3](P18)诸葛亮是否应该承担丢失荆州之责任我们姑且不论,但未派得力之人加强夷陵防务以确保荆州后方安全从而导致关羽顾此失彼而兵败身亡则是客观事实,这只能说明蜀汉集团的麻痹大意。而与蜀汉麻痹大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吴集团对于夷陵的高度重视,孙权在派吕蒙袭占江陵等地的同时,命令精明强干的陆逊迅疾夺取整个夷陵地区,西至秭归一线,封锁峡口,彻底断绝了关羽回防夷陵的企图。战略重心不同,胜败已见分晓。

第二,举措失当,贸然下令关羽北进。关羽守荆州,无论是将帅个人的综合素质,还是军队的总体实力,都是勉为其难的。荆州中心之地是南郡江陵,江陵之北、之东、之南均无险可凭,又与曹魏、孙吴两大强敌紧邻,关羽所承受的压力十分沉重。客观情况决定了关羽在荆州只能取守势,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将紧靠江陵西部的夷陵地区作为荆州之后院,牢牢守住这个后院,就可以使孙、曹集团不敢轻举妄动,关羽坐镇荆州的十余年中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方略,虽然他对于夷陵的重视程度不够。然而,曹刘汉中战役打响之后,这种局面完全改变了。建安二十三年,蜀汉集团为了策应汉中战役,另外发动了两路进攻:一路是孟达由秭归经山路北上攻占房陵、上庸,后又派遣刘封自汉中沿汉水东下与孟达会师上庸;一路是关羽由江陵北上攻击樊城。前一路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上庸地区位于汉中地区的东南部,其南部连接夷陵地区,占领上庸地区就可以将汉中、夷陵两地连成一片互为犄角,这对于蜀汉集团无疑十分有利。但关羽北攻樊城的行动则显得相当草率和冒失,樊城与汉中相距千里之外,中间隔着千山万水,进攻樊城并不能真正起到策应汉中战役的作用,反而会使江陵、夷陵一线变得空虚,给东吴以可乘之机。即使要策应刘备的汉中战役,关羽派一支偏师在宜城、襄阳一线作佯攻也就可以了,决不可远离江陵、夷陵一线的大本营。然而,关羽恰恰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

据《三国志》记载,大约在建安二十三年秋,刘备进军汉中。同年冬,关羽亲自率部北上进攻曹仁,这可看作是对刘备汉中战役的策应。建安二十四年春三月,曹操兵败汉中。五月,“引军还长安”。就是说,刘备汉中战役在五月间就已结束,此时,关羽的军事行动应该立即结束,回防江陵、夷陵等要塞。奇怪的是,本属于佯攻方向的关羽却变成了主攻方向。建安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关羽发起樊城战役,并利用雨季洪水大败曹军,斩庞德,擒于禁,初战告捷。这使得曹

操立刻把重心转移到荆州,不断增派人马前往宛城、樊城一线。同时派使者联络东吴夹击关羽,关羽大祸临头却毫无知晓,终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关羽贸然进攻樊城是自己独断专行还是刘备命令所为?史籍语焉不详,但《三国志·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假节钺”是封建时代皇帝对臣下高度信任的象征,赋予大臣以独断专行的特权。刘备在夺取汉中后给关羽以“假节钺”的封赏,显然有让关羽解决荆州北部问题的意图。所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描写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直接下令关羽“领兵取樊城”,不一定是无中生有的事。关羽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但曹仁、满宠死守樊城不退,徐晃等各路援军纷纷赶来,樊城战役呈现胶着状态。而就在关羽无法脱身樊城之际,东吴吕蒙乘虚袭占了公安、江陵,陆逊袭占了宜都、夷陵、秭归一线,又北上打败了蜀汉房陵、南乡等处的兵马,夺取了许多山地关隘,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夷陵地区。此时的关羽如梦初醒,急忙回防夷陵要塞,可为时已晚,在当阳麦城遭到了悲惨的剿杀,蜀汉集团从此一蹶不振。毛纶、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回评》中抱怨说:“孔明若不使关公取樊城,则荆州可以不失;即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将以代公守荆州,则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计不出此,此不得为孔明咎也,天也。……人欲兴汉,而天不祚汉!”[3](P362)毛氏父子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来解释荆州之失不足为训,但他们也客观地道出了刘备、诸葛亮轻率下令关羽远离夷陵、江陵北上进攻樊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关羽失荆州之后三年即东吴黄武元年,刘备为夺回荆州发动了伐吴之战,双方在夷陵地区展开大战。此战之初,虽然刘备气势汹汹,但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蜀汉集团内部意见不一,赵云、秦宓、诸葛亮等重要战将、谋士认为当前主要敌人是曹魏,伐吴时机不成熟,而刘备等人执意要发动伐吴之战,这显然是一次轻率的军事行动;二是东吴夷陵守将陆逊极有头脑谋略,为提防蜀汉集团的报复,他花了数年时间对夷陵地区的防务作了极为周密的部署,为打败刘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备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所以,刘备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同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打了一场使自己身败名裂的战争,也使蜀汉从此再也无力东顾,可谓“秋风落叶,大势已去”。

今天,宜昌地区(古夷陵)留下了许许多多三国气息的地名和遗迹,如长坂坡、麦城、关帝陵、猓亭、陆城、夷陵道、马良镇、教师口、驻马溪、兵营溪、马回溪、

点兵河、擂鼓坡、落阵岭、跌马坡、交战头等等,面对这些地名、遗迹,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三国古战场,在赞叹陆逊、孙权、吕蒙、陆抗等三国名将功业的同时,也会为蜀汉英雄们的悲剧而深深惋惜。

总之,三国之争,争在荆州,荆州之争,争在夷陵,夷陵在汉末三国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历史是无情的,它容不得任何人哪怕是一丝的麻痹大意,“大意失荆州”是蜀汉英雄悲剧的开始,而大意失夷陵则是失荆州的“死穴”。古城夷陵最终成了蜀汉英雄们永远的伤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三国演义》

》不就是一种伤痛的回顾、反思与叹息吗?

参考文献:

- [1] 郭化若. 孙子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83.
- [2] 陈寿. 三国志[M].
- [3] 朱一玄, 刘毓忱.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刘自兵]

Yiling as the Focus for the Three Kingdoms to Fight for Hegemony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ilitary Strategic Value of Yichang District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WANG Qiancheng YANG Ai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Hubei, China)

Abstract: Yichang, called Yiling in ancient times, is the west fort of Chu. It is of high strategic value in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It is the true fighting focus of the armi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fighting focu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Jingzhou and the fighting focus for Jingzhou is Yiling. The tragedy of Shu group originates from the loss of Yiling. Yiling is the forever pain of the heroes of Shu Kingdom.

Key Words: Yiling; strategic value;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the Three Kingdoms; tragedy of Shu Kingdom